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日本现代化研究

张旅平　著

文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中，东亚是世界各地区中变化最大的地区。东亚地区的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也远远超过西方国家曾经创造的纪录。高速经济增长带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使东亚地区成为战后世界工业化—现代化高潮中的佼佼者。

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迄今为止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浪潮。从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开端，到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一次大浪潮，中心区域在西欧。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中心区域从西欧扩大到东欧与北美，拉美地区也受到很大影响；同时越过欧陆传到东亚，在日本取得独一无二的成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代到目前，出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这次大浪潮扩散到亚、非、拉广大地区，但中心在东亚地区。

东亚由中国与日本两个大国及若干东亚边缘区的小国和地区所组成。到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除日本以外，这整个地区都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经济欠发达状态。除日本以外，东亚各国都是在二次大战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才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但在短短的四十年中，整个东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高速度发展的惊人成就。中国从被讥为“ 东亚病夫 ”的农业国一跃而为强大的新兴工业—农业大国。东亚原来的唯一的工业国日本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但战后的重建运动实质上

是进行了第二次现代化，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东亚的边缘国和地区都高速推行工业化，其中最突出的台湾省、韩国、新加坡、香港，被称为“四小龙”，在最近二十年中已变成全世界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NICs,NeW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nd Areas）。近年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也看好，甚至越南也在发生明显的重要变化。从长远来看，东亚的新兴的经济—文化区的前景正引起举世瞩目。

现代工业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文明。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是工业化，工业化的重要经济特征是产业结构的改变与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又称之为“现代经济增长”。这是从人类社会大生产力形态的改变中来的，因而标志着一个特殊的经济时代的到来。最初，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这种经济增长只在很小的英国某些地方出现。当时人均国民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已是一个历史性的创新。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在西方先进工业国中这一增长率达到1—2%，即提高约一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增长率又翻一番，达到3—5%，被称之为“经济奇迹”。但真正的经济奇迹出现在东亚地区。这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工业化进程中把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增率提高到7—8%，甚至更高，一般都高出西方发达国家年平均增长率一倍以上。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全新势头。

东亚的重新掘起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扬眉吐气，也使西方国家感到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都面临着东亚的新的挑战。东亚的新经验表明，不论是西方自由派的现代化理论还是激进派的依附理论都远远落后于实践。各国关心发展问题的专家、政治家以及企业界人士，都密切地关注东亚的发展势头，从发展战略、模式、体制、文化传统、历史条件等各方面研究东亚社会创造的现代化“奇迹”。这是值得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加以

重视的。当前，我国正努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握机遇，积极投入新的世界发展大潮之中，在这一形势下，深入研究我们近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各种新经验，是一个迫切的任务，这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我们都具有重大意义。

《东亚现代化研究丛书》是一个新的研究园地。耕耘者大多是中青年学者，他们试图用新的理论，从经济、政治或社会变革的多角度，去探讨东亚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动向。这种钻研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我相信，这套丛书能给关心现代化的广大读者带来新的知识、新的思考；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必将通过探索、学习与借鉴而不断提高和前进。

罗 荣 渠

1993年2月28日于北京大学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导　　言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著名武士西乡隆盛说过：“ 有两种机会，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一定要自己创造出机会。 ”西乡隆盛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日本民族那种不甘落后，不畏艰险，想方设法，力争上游的性格。作为地域狭小的岛国，日本早在古代就不断地寻觅和创造机会，以图摆脱小国的边缘地位，称雄于东亚，甚至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虽然身处儒教文明圈内，但却早早地和在古代大部时间中游离于中华帝国的以华夷秩序为基础的朝贡体制（删封体制）之外的缘故。为了达到称雄的目的，日本远在古代就曾经发动过针对中华帝国的侵朝战争。丰臣秀吉甚至扬言要把日本的国都迁至明代中国的宁波府。

然而，直到近代以前，日本尽管做出过种种惊人的努力，甚至策动明太祖朱元璋的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但由于条件限制，始终未能寻觅到和创造出这种机会。就那时中日两国的情况而言，两国同属于一种类型的文明，即儒教文明，而且后者的许多文化是从前者移植而来的。一个是文明的发源地和实力雄厚的文明大国，另一个是以他者为师的势单力薄的文明小国。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大海的阻隔，如果说强大的蒙古远征军都未能过海征服日本，那么相对弱小的日本想要到海外去战胜东亚大国则显得颇为自不量力了。日本要想称雄于东亚，实现自古以来的梦想，

①转引自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24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就必须有一个与周围国家不同的（与儒教文明不同的）能使自己迅速发展和异军突起的文明。今天看来，这种文明只能是现代文明，也就是工业文明。

但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是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的。马克斯·韦伯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指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物质“质料”，而且也需要一种理性的经济伦理或“精神”，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产生革命性的综合。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能出现的。根据这一原则，韦伯考察和比较分析了世界各大以宗教为轴心的文明圈，指出在世界各文明圈中，只有基督教新教（清教）文明圈最具有导致现代工业文明形成的文化取向。因此，现代工业文明首先在该文明圈的范围——西欧——产生，不是偶然的。日本地处东亚一隅，属于儒教文明圈的一员。无论其自产的以水户学为基础的国学文化，还是外来的净土宗（尤其是经过改造的净土真宗）文化或儒教文化，尽管在个别要素上存在有助于工业文明产生的经济伦理，如敬业、勤奋、节俭，但就其整个体系而言，是缺乏产生该文明的内在驱力的。因此，与东亚各国一样，日本要想获得工业文明，就必须进行新的文化的移植，对日本来说，也就是第二次大规模地接种新的文化类型，实现从“和魂汉才”向“和魂洋才”的转变。

对于日本人来说，幸运的是正当他们苦苦地寻求和创造自我发展的机会，而又无所获的时候，世界现代化浪潮由西向东滚滚而来。它在给东亚带来“血与火”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机，新的文明，新的希望，新的机遇。应该说，这个新文明、新机遇是给予整个东亚各国的。但是，在东亚，只有日本对此给予了迅速、敏感和强烈的反应，而其它国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均处于十分麻木不仁的状态。其结果，必然是最东方最后接触这一浪潮的日本，却最先抓住了机遇。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所获得的使自

己发展的机会不仅是被给予的，而且也是日本自己创造的：在日本日趋陷入半殖民地的非常危险和艰难的时刻，日本却创造出迅速向走现代化的机会。由于捕捉到和创造出良机，日本最终迅速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性的划时代的转变。

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抓住机遇，实现转变，是与日本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与中国的原生性文化不同，日本的文化是继发性的。日本没有自己的中国那样的轴心文明”时代，不是文化圈的发源地，本身缺乏文化自创性，因而历来靠引入外来文明丰富和发展自己。日本文化的这种继发性使得日本在文化上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学习和接种他者文化的取向。如果说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华夷秩序”观念，那么日本人在这方面则是相对缺乏的。其结果，必然是在对待外来文化上，中国往往呈现出抗拒多于融合的特征，而日本则表现出融合胜于抗拒的文化取向。既然日本在古代形成“和魂汉才”文化类型时并没有多大困难，那么在近现代转向“和魂洋才”文化类型时自然也轻松自如。文明的融合使日本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现代化。在非基督教世界，日本之所以成为唯一逃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恶境的国家，显然是与这种文明的内在融合分不开的。

日本一旦摆脱了它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成为“半边缘”国家，称雄于东亚，便开始向该体系的“中心”即世界强国地位急行军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谁也没有想到日本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在这近半个世纪和稍后的一段时期中，日本不仅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罗斯，而且对西方日益构成巨大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虽然因战败而被抛入“半边缘”的地位，但经过20几年的奋力搏斗和发展，70年代便再度崛起，逐步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再次重演了学生击败老师的一幕。

如果说日本是通过迅度大规模接种西方现代文明而成为世界

强国的，那么后来当它在经济发展上超过了西欧各国，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美国而成为令西方世界震惊和恐惧的经济大国时，其成功就不仅仅是接种和学习西方文明的问题了。日本在明治时代和战后两度出现“奇迹”，显然与其文化（经济伦理和民族精神）取向密切相关。这个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儒教文化。儒教文化，就整个体系而言，是不会产生现代工业文明的，但当它的个别要素与西方现代文明融合在一起时，便会形成一个十分有助于发展的较完美的模式。日本就是凭借这种融合而崛起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对西方的胜利是文化上的胜利。没有儒教文化，日本是不可能超过西方的。

但是，同属于一个儒教文明圈的东亚其它国家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一点呢？这就不能不涉及儒教文化的多样性了。日本的儒教虽然来自中国，但它一进入日本列岛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如果说中国对儒教的解释是个体主义和人本或人道主义的，那么日本对儒教的解释则是民族或集体主义和尚武精神的。前者以“仁”为核心，后者的中心则是“忠”。也就是说，日本的儒教是“武士道”化的儒教。这种儒教文化养育出的社会有着一个“各守本分”的“纵式”结构，呈现出极强的“团体主义”精神。这是东亚其它国家所不具有的，也是它们未能象日本那样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当日本把这种文化要素与西方现代文明融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东西方许多国家所不具有的杂交优势。日本就是凭借这种优势一步步走向东亚顶峰，走向世界体系的中心，走向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的。

目　　录

导　言

第一章　历史遗产：日本传统文明的框架及其取向……1

一、继发性的、吸纳—外向性的混合型文明：

日本文明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基因……1

二、日本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日本传统文明的基本框架……12

三、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日本传统文明的显结构……21

四、民族精神和文化取向：

日本文明的潜隐或深层结构……32

第二章　日本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遭遇：

现代性的痛苦萌发……52

一、西学西势东渐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变迁……53

二、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与日本最初的反应：

“锁国”……60

三、现代化浪潮第二阶段的冲击与日本的反应：

“开国”……73

第三章　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明治维新……98

一、日本为什么会有明治维新？……99

二、明治维新为什么能成功？……112

小结……140

第四章　新型文明的形成：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和准备起飞…143

一、社会的科层化……143

二、“文明开化”与现代文明的大规模引入……148

三、走向法制现代化……169
四、“殖产兴业”：工业化的全面启动……176
第五章　产业革命的完成与经济“起飞”……192
一、早期产业革命：经济开始“起飞”……192
二、产业革命的完成：经济加速“起飞”……196
三、第一次“奇迹”出现的原因……209
第六章　日本现代化实现的社会一文化因素……218
一、社会中心的定形化及其作用……218
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227
三、世俗伦理与民族精神……224
四、企业文化……248
第七章　现代化模式的特征与缺陷……261
一、失衡的模式……261
二、走向深渊……265
第八章　再次维新：战后社会改革和社会重建……269
一、废墟与国民心态……269
二、社会的改革与重建……275
第九章　重新“起飞”和走向繁荣……283
一、“神风终于刮起来了”……283
二、第二次“奇迹”的出现……290
三、成为“经济超级大国”……293
四、成功之道……295
结　论……304

第一章　历史遗产：日本传统文明的框架及其取向

一、继发性的、吸纳—外向性的混合型文明：日本文明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基因

1．环境及其文化心理功能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由诸岛组成的东亚岛国。其东、南滨临浩瀚无际的太平洋，西、北隔日本海、朝鲜海峡、黄海与亚洲大陆相望。这种地理位置决定了日本在古代只能同亚洲大陆，尤其是该大陆上的中国文明以及受中国文明深刻影响的朝鲜文明交往。

作为岛国的日本与中国最大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海洋对两国在古代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中国虽然东、南临海，古代历史上也有过“郑和下西洋”那样的航海壮举，但在古代，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活动的中心和主要场所是在内陆。中国在古代实质上是一个内陆国家，一个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国家，直到被西方洋枪洋炮打败之前，几千年来，她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满足，自我陶醉，华夷秩序和大国文化心理使得她从不求助于人，正如乾隆帝致英王书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沾余润。”①因此，海洋对古代中国没有特殊的积极意义。总起来讲，它不是交往的通道，而是沟通的屏障。与中国不同，海洋对于日本始终有着绝对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是形成特殊岛国文化的基本条件和契机，另一方面又是古代日本接种新文明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环海，从内向来看，它给日本带来的是封闭性；而从外向来看，它又使日本呈全方位开放态势。相互矛盾的性质并存，是日本民族和文化的重要特征，给日本列岛以深刻的影响。

首先，环海隔绝，给日本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岛国文化特有的一种孤独感。岛国都有孤独感。例如英国就是如此。但由于英国诸岛自古就受古罗马人、古日耳曼人的一支——朱特人（Jute）以及诺曼人的相继入侵和移入，以及与欧洲大陆有着更多的互动，因此孤独感要弱得多。与此相比，“日本孤立于亚洲大陆远甚于英国诸岛孤立于欧洲大陆”，因而孤独感便更加深重。日本在形成统一的国家后，再没有大规模的外族人的移入和野蛮入侵，因而相对封闭，孤独感深重也就是自然的了。这突出地体现在日本民族对孤独感的化解上。例如，日本文学刻意追求“寂静”、“静寞”的意境，通过将人的深重的寂寞、孤独感受升华到文学美感中“寂寞美”的意境去体味、欣赏和化解内心的张力，这是日本民族心理表现的典型特征之一。

其次，环海封闭与孤独使日本民族不仅具有内向心理特征，而且还如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在《日本的性格》中所说的那样，“对外界的刺戟非常敏感。”封闭和孤独使任何处于此种环境中的人和民族对外部刺激都会具有敏感性。例如，深山老林中的人

①引自《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35，第15页。

②Robert J.Smith: Japanese Society, 198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9.

或民族对山外林外之事，总会感到惊奇，常常投以诧异的眼光。这是因为被封闭和孤立的民族或和文化具有更强烈的同质性和群体自我亲近感，难得刺激。它使得内外反差加大，人们极易分清内外，辨别异同。这种同质性和亲近感越强，对外部信息的反应就越强烈。这也是为何都市人比山村人，发达地区的人比封闭落后地区的入对外界刺激反应迟钝（见怪不怪），而后者比前者反应敏感（见怪觉怪）的原因。不过，与大山老林相比，由于沟通工具落后的原故，在古代大海的封闭和孤立作用程度要高得多。岛国的日本对海洋彼岸的一切总是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新鲜感。这使得日本民族自古就有一种冒险、探险精神，一种因孤独和封闭得太久太深而总想打破这种封闭和孤独的意向和向外看的倾向。这一点与欧洲的岛和半岛之国有相似之处，但与中国大为不同，如果说中华民族是大地之骄子，那么大和民族则是海洋的儿女。如同爱之越切。恨之越深一样，封闭和孤立越大，就越想摆脱之。

日本民族和文化心理的成长不仅与环海紧密相关，而且与岛内的陆地环境相关。日本列岛的地势南北狭长，东西窄短。从北端的寒带到南端的亚热带，气候差别很大，中央部分属温带，气候温和，可是由于地势狭长，中间纵贯着险峻的山脉，两侧土地分向日本海与太平洋急剧倾斜，缺乏平原；河川除少数外，大多浅而湍急，雨量一多，就有泛滥之虞，加之常有火山、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以及自然资源的匮乏与人口的压力，岛国的相对狭小，自然局限和文明历史的短暂性和外发性，这些条件和情况深深地震憾着日本人的心灵，影响着日本民族，使日本民族心态中首先蕴藏着对自然威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以及幻灭感、压抑感和危机感。对于任何一个在自然方面多灾多难的小国寡民来说，都有这种感受。但日本民族的这种感受是极为深沉和强烈的。古代的《平家物语》、江户摇蓝曲，以及许许多多的日

本民歌和儿歌，尤其是泷廉太郎的名曲《荒城之月》，借助自然现象对此给予了突出的反映和表现：

岁月如流春已去，消逝花丛里；
狂欢时节最难忘，燕尔新婚时；
荒城繁华今何在，欢声已沉寂；
悠悠往事如云烟，朦胧月色里。
秋来大地颜色变，披上红衣衫；
雁行成群天上过，年年复年年；
逝水流光逐飞岛，明月照高天；
月色茫茫城影暗，无语对秋眠。

无常的幻灭感，如樱花璀璨一时，旋即凋谢，一方面是壮丽，另一方面却是哀恸；哀伤沉重的压抑感如台风海啸扑天盖地而来，令人窒息；深刻的危机感，仿佛天崩地裂即将发生，使人惶惶不可终日。感觉如此幻灭，情调如此哀伤压抑，意识如此危机，这是具有大山、大河、大川、大平原，物产丰富、文化博厚精深的内陆大国民族少有的。

然而，日本民族绝非那种仅仅沉浸于幻灭和哀伤情感之中的民族，也不是到天国彼岸世界（宗教领域）寻找出路的民族。一个小国横跨三个气候带以及由此造成的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复杂多样化，一开始就使日本人习惯于多样化因素并存的环境，培育了他们灵活的适应性和务实性。压抑感和危机感使日本民族孕育了极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与选择、应变能力；幻灭感和孤独感培育了他们注重现实，及时行乐的特点以及扩展视野的需求与努力。总之，日本民族既承认命运的存在，又竭力去与命运抗争。求生存的需要使得他们学会了巧妙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具有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的灵巧性。幻灭感、压抑感、危机感与灵活性、适应性、求变性、务实性、开放性并存是日本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与地大物博，在古代始终处于文明“轴心”的东方大

陆文明熏陶出来的中国人的特点和气质，如博大精深、安于现状，知足长乐、不善变化，以及多优越感，少幻灭感、压抑感和危机感，相去甚远。

自卑感，人类本身最深沉的一种自卑感，是日本民族的另一个突出的特性。不论是刚强、坚毅、冷酷、自制的“武士道”精神，还是野蛮凶残的侵略，或是在经济上迅速称雄世界，皆不过是此种深沉的自卑感折射的表现。与前面所提到的诸感受一样，这种自卑感当然也是由日本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岛国局限，以及文明的发轫和成长过程等生态和历史因素所致。如同一个人的自卑感来自生理或心理缺陷一样，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卑感则来自生态或历史因素。在这一点上，一个国家和民族与个人是一样的。而且，一旦自卑感是来自生态或历史因素，那么它便几乎是“天然的”了。于是，自卑感变得极度深沉、极度痛苦，极度绝望。

自卑感往往会使人消沉，到宗教世界去寻找解脱，如基督教徒那样。然而，尽管日本民族永远无法摆脱生态缺陷造成的自卑心理的阴影，但它毕竟是一个产生了武士道，后来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民族。日本民族在自卑的同时，却不甘寂寞和落后，不能容忍在它周围有比它更发达的文明的存在和更强大的国家的存在。于是自卑被化为一种极顽强的奋斗精神和抗争气质、赶超信念。自信、自强、甚至自负是日本民族性格的另一面。它与自卑心理恰巧形成一个矛盾：越是自卑，越需要得到世人的承认、尊敬和博取荣誉。过去日本天皇与中华帝国的外交文书中常用“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或“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等语①，就是突出的表现。明明是小国，却要以大国自居。日本不甘以小国的卑屈地位立足于世界，矢志与大国平起平坐，甚至争当霸主这

①见中国《隋书东夷传》。

一愿望，都因生态环境的缺陷所造成的自卑感而绝望。但却反而激发了日本的凶悍、蛮横、奋争和狂妄的野心，以寻求自卑缺陷的弥补。可以说，没有自古就向日本辐射文明的中国，没有近现代世界其它强国，便不会有日本民族的深重的自卑和耻辱感。而没有这种自卑感，日本极可能丧失疯狂地追求荣誉感和奋争精神的动机。自卑感，最深沉和痛苦的自卑感和耻辱感，既是日本在历史上所造成罪孽和历史悲剧的祸首，又是日本借以奋发图强的功魁，即深层动力。

作为日本民族矛盾心理基本特征的自卑感与自强精神，从古至今无时不刻地顽强表现出来。它既造成悲剧，也导演喜剧。当它被外界力量制约住的时候，它便会化刀为花，并最终结出硕大无比的经济之果。

2．继发性的多元复合文明

历史悠久，范围广大，内容深邃，成就辉煌，影响久远的东亚文明或“儒教”文明圈，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圈、西亚—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圈和南亚佛教—印度教文明圈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圈。如果我们沿着东亚文明或文化之核——儒教去观察，不难发现，该文明导源于中国，定形于“轴心时代文明”的中国。中国是东亚传统文明的轴心，而文明圈内其它国家的文明无不是该轴心辐射的结果和变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换言之，中国是东亚文明之“源”——“原生态”，而其它东亚国家的古代文明则是这个“源”的“流”，或“原生态”的“变型态”。任何研究古代东亚文明的人，部不能不分析这种“源”与“流”，或“原生态”与“变型态”之间的关系。

作为东亚文明或儒教文明之核的中国文明，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东亚这块古老的大陆上，经过长期与大自然作斗争的社会生活，独立自主地创造出的具有独特特质的传统文化模式。它经过几千年的发轫、发展，于春秋战国时代——所谓中国

文明的“ 轴心时代 ”①——基本形成，并在秦汉之后最终“ 定型 ”。以后宋、明时期虽有变动，但始终未超出原有框架。由于该文明是自主独立地生成的，因而被称为“ 原生 ”或“ 原发 ”性文明。这种文明一经定型，便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与其周围不同种类的古代文化或不同文明圈的文化交流、碰撞时，显示出强有力的主导性和不被同化的自主性。难怪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 中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之间的交往和反应，要比一向所认为的多得多，尽管如此，中国思想和文化模式基本格调，却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 ”②

中国传统文明的自立特点不仅表现为原生性，而且还表现为相对“ 单一性 ”。从古至近代，它一经形成和定型，便不为它者所动，期间尽管经过了多次民族之间的战乱和与世界所有大型宗教文明或文化圈内的文化要素相碰撞，但其主体和框架基本完好地延续下来。对于其周围的不同文化的民族入侵来说，要么它最终被同化（如满族），要么最终被排斥出该文明圈（如蒙古族）不仅对于低层次的落后的文明是如此，而且对于同等层次的外来文明也一样。对古代中国曾有较大影响的佛教，自东汉从印度始入中国，至隋、唐达到鼎盛时期，虽为官方一度提倡并与儒相提并论，但其最终受到抑制，被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儒教的附庸。就伊斯兰教文化而言，其于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宋元以后有一定发展，明末清初除出现过一批伊斯兰教学者外，经堂教育也开始兴起并得到发展，但它尽管身处中华大地，占有相当广阔的地域，却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的“ 国教 ”，无

①参阅S.N·艾森斯塔德：《传统·变迁·现代性》（纽约：自由出版社）1972年版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